

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步 平

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教科书如何反映侵略战争历史的问题一直存在斗争。进步学者为编写正确表现历史的教科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艰苦的努力,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近年来日本大部分教科书逐渐吸收了进步学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正视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右倾和保守势力则竭力篡改历史,回避和掩盖战争责任,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对现行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猛烈的攻击,给教科书出版社制造了巨大的压力。多家出版社迫于政治压力在2002年新版教科书的送审本中回避了许多重要的侵略事实,改变了许多重大问题的观点,这是明显的历史倒退,应当引起注意。

关键词 教科书 南京大屠杀 从军慰安妇 战争责任

今年7月,许多国家的媒体都纷纷披露了日本多家出版社在送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战争历史事实描述的重要变化,指出掩盖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危险性,并呼吁人们关注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和战争责任的认识上正在发生的严重的倒退。那么,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在侵略历史事实的记载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日本社会的政治倾向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本文将对这些情况进行具体的说明。

一 2002年版日本教科书的送审本

目前,日本有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不同版本的供初、高中使用

的社会科教科书(包括历史、地理、公民部分),现在使用的是1997年的版本。其中有7家出版社的初中教科书涉及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问题,它们是: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清水书院、帝国书院、日本书籍和日本文教出版。2000年4月,这7家出版社分别在1997年版教科书基础上编写出了新的2002年的教科书稿本,按照规定送交文部省审查,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这一送审本。与现行的教科书相比,这一修改后的送审本最大的问题是明显地回避和露骨地掩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

下面是1997年版教科书与同一出版社2002年版送审本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记述的对比。

1997年版教科书

(一) 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

东京书籍

许多年轻妇女也被作为从军慰安妇强制性地征用战场上。

大阪书籍

A 另外,朝鲜等国的年轻妇女也被作为慰安妇强征到战场。

B 也有的人认为不仅是政府间的赔偿,对于被强制征用的士兵和从军慰安妇个人也应当赔偿。

C 在战后赔偿问题的部分

2002年版送审本

东京书籍

删去

大阪书籍

A 删去

B 删去

C 删去

根据日本“子どもと教科书全国ネット”事务局长俵义文提供的资料及《慰安妇问题と教科书攻击》(高文研1997年东京版)一书记载整理。

附有照片, 说明为: 为要求日本政府进行战后赔偿而游行的韩国的原慰安妇

教育出版

A 还有许多朝鲜妇女被作为慰安妇强征到战场

B 战争结束 50 年后的现在, 亚洲各国的人们要求对战争被害进行赔偿的呼声仍很强烈。其中不仅有原从军慰安妇, 还有被屠杀、被抓劳工和强制劳动的人们

C 到 1994 年, 除上面照片中的原从军慰安妇外, 还有许多被抓的劳工和被强制劳动的受害者们, 共有 20 多件关于战后赔偿的诉讼在进行

日本书籍

还有, 强迫女性作为慰安妇从军, 对她们进行了迫害。

教育出版

A 还有许多朝鲜女性同时送到战场

B 删去

C 删去

日本书籍

另外, 朝鲜等亚洲各地的年轻女性被强制性地作为日本兵的慰安妇送到战场上。

(关于日本的战后处理) 也有人认为, 即使政府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但是作为个人也可以就被害向日本要求赔偿。事实上, 已经有被强抓的劳工、被强迫作慰安妇的妇女以及南京事件的

日本文教出版

也有作为慰安妇跟随军队
行动的女性。

清水书院

另外, 朝鲜和台湾的女性
中, 有在战场上的慰安所中服役
的。

帝国书院

A 在战争中, 男人被征兵,
女性被作为慰安妇征用, 经历了
难以承受的苦难。

B 来自这些地区的人们中,
有作为慰安妇的人。

(二) 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

东京书籍

战火从华北燃烧到华中, 同
年, 日军占领了南京。当时屠杀
了 20 万人, 包括妇女和儿童。

大阪书籍

日军在各地遇到了激烈的
抵抗, 在占领南京后屠杀了据说
20 万的民众, 遭到各国的批评。
当时向日本的国民封锁消息。这

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
的要求, 进行了诉讼。

日本文教出版

删去

清水书院

另外, 在非人道的慰安所
中, 不仅有日本人, 也有朝鲜和
台湾的女性。

帝国书院

A 删去

B 删去

东京书籍

战火从华北向华中蔓延, 同
年, 日军占领南京。在这一过程
中, 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
大量中国人, 这就是“南京事
件”。

大阪书籍

日军在各地遇到激烈的反
抗, 而且战场也扩大了。在占领
南京时, 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
内的许多人, 受到各国的批评。

一事件被称为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方面认为被屠杀的人数是30万人。

教育出版

A 日军占领上海和首都南京,夺走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秩序。占领南京之际,日军大量屠杀许多包括放下武器的士兵、儿童和妇女的当地居民,进行了掠夺,这就是南京屠杀事件。

B 事件的牺牲者达20万以上,中国方面认为包括死于战场的达30万人。

这一日军的暴行遭到世界舆论的抨击,但是一般的日本国民在战后才知道这一历史事实。
日本书籍

A 日军进攻华北、上海,占领南京,夺去各地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

B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两个半月,屠杀了包括女性、儿童和俘虏在内的15到20万中

南京事件虽然受到国际舆论的抨击,但是由于日本向老百姓封锁消息,在战后进行东京审判时,人们才得知这一事件的规模和牺牲者的实际情况。

教育出版

A 日军战线向南扩展,占领上海和南京时,夺去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在占领南京之际,日军犯下了包括杀害俘虏、儿童和妇女的暴行。

B 删去

日本书籍

A 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当时,因为据称有20万的俘虏和平民遭到屠杀,所以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

B 直到战争结束,许多日本国民并不知道这一事件。

国民众。

C 这一事实当时不让日本的民众知道。

日本文教出版

A 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占领南京时，屠杀了大量中国民众，这就是南京屠杀事件。

B 日本国民并不知道。

C 关于在这一事件中牺牲的人数，估计包括俘虏和一般市民在内有十数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称有 20 万人，中国说有 30 万人以上。

清水书院

另外还在中国有许多残暴的行为。特别是在占领南京之际，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中国方面的放下武器的士兵、老人、妇女和儿童。包括士兵在内，死亡的人数在十数万以上，中国方面估计有 30 万人。当时，各国都强烈谴责这一大屠杀事件，而日本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一事实。

日本文教出版

A 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这就是南京屠杀事件。

B 而日本的国民不知道。

C 这一事件的牺牲人数尚无定论。

清水书院

A 烧杀掠夺的行为陆续发生。特别是在占领南京之际，无差别地杀害了包括俘虏、放下武器的士兵、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民众。如果包括战死的士兵，这时的死亡人数很多。各国强烈谴责这一南京大屠杀事件。

B 关于死者的数量，有数万人、十数万人、三十万人的几种估计。

帝国书院

日军向南进攻, 占领上海和首都南京。在南京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许多中国人, 各国谴责了日军的暴行。

(三) 关于三光作战

大阪书籍

另外, 从 1940 年开始, 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所谓“三光”作战, 摧残中国人民的生命, 破坏他们的生活。

教育出版

另外, 从 1940 年开始, 日军对华北的抗日运动的根据地进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所谓三光作战。这一行为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但是一般的日本人直到日本战败后才知道这样的事实。

日本书院

另外, 日本在 1940 年对共产党游击力量活跃的华北农村进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所谓“三光”作战, 威胁民众。当时, 日本国民不知道这一事实。

日本文教出版

帝国书院

日军向南进攻, 占领上海和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许多中国人, 各国谴责了日军的暴行。

大阪书籍

删去

教育出版

删去

日本书院

日军从 1940 年起为摧毁华北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行动, 中国方面称之为烧光、杀光、抢光的所谓“三光”作战。

日本文教出版

驻华北的日军对共产党游击队进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作战从 1941 年开始到第二年。	删去
清水书院	清水书院
1941 和 1942 年, 对共产党力量大的地区进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	删去
(四) 关于七三一部队	
教育出版	教育出版
七三一部队在中国进行了国际公约禁止的细菌战和化学战, 把俘虏称为“原木”, 对其进行活体解剖和人体实验。	删去
(五) 关于“侵略”一词的使用	
东京书籍	东京书籍
韩国掀起了广泛的民族抵抗运动, 以反对日本的侵略。被解散的士兵同农民联合起来, 开展了名为“义兵战争”的武装斗争。	于是, 韩国的民族抵抗运动广泛开展, 被日本解散的士兵与农民联合起来。 关于“义兵战争”的记述被删去。
义兵战争就是朝鲜人民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	
大阪书籍	大阪书籍
A 题目: 帝国主义列强的世界和日本侵略亚洲	A 题目: 日清、日俄战争与亚洲的形势
B 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	B 删去
C 于是, 日本在牢牢控制朝	C 另外, 日本在牢固地控制

鲜后进一步向中国伸出侵略的触角。企图从北方侵略亚洲的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强烈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给清朝。

D 题目：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

E 日本军部和国家主义者们主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企图通过侵略满洲以转移日本国民对于生活贫困和政党争斗的不满情绪。

F 题目：全面侵略中国与战时体制

G 国民政府终于实现了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同日本的侵略进行斗争。

H 题目：日本侵略东南亚与太平洋战争

I 日本为打破在中国战场上的僵局，侵略东南亚以夺取资源，并切断同盟国支援中国的道路。

J 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有大约 355 万日本兵被派出参加了侵略战争。

教育出版

了朝鲜后，开始进入中国。但是，企图从北方进入亚洲的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强烈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给清朝。

D 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中国

E 在日本军部和国家主义者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企图通过对满洲的控制以转移日本国民对于生活贫困和政党争斗的不满情绪。

F 日中战争的扩大与国民生活

G 国民政府停止同共产党的争斗组织了抗日统一战线，决定与日本战斗。

H 走向亚洲与太平洋的战争

I 日军为打破日中战争的僵局，向南夺取资源，同时切断美国和英国支援中国的道路。

J 删去

教育出版

题目: 日本侵略中国

日本书籍

A 题目: 帝国主义列国侵略中国

B 题目: 开始 15 年战争

日本文教出版

A 题目: 欧洲各国侵略亚洲

中国将日本的侵略控告到国联, 但日本在 1932 年成立满洲国。国联派调查团了解实情, 提出了否认满洲国的决议。

日本不加宣战就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全境, 中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击日本对中国侵略。

B 题目: 侵略东南亚

清水书院

题目: 近代日本与中国, 侵略朝鲜

帝国书院

A 题目: 列强侵略中国

由于外国的侵略, 在中国掀起了驱赶外国势力的运动。

题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

日本书籍

A 题目无, 正文中保留了“侵略中国”

B 题目: 开始 15 年侵略战争

日本文教出版

A 题目: 欧美列强进入亚洲

1932 年, 日本建立满洲国, 国联接受中国的控诉, 派遣调查团了解实情, 提出了否认满洲国的决议。

战争开始不久, 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合作, 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B 战争的扩大

清水书院

合并后题目取消

帝国书院

A 题目: 三国干涉与北支

事变

于是, 在中国也发生了排斥

外国势力的运动。

B 题目：军部的抬头与侵略 B 删去

中国

C 题目：日本侵略满洲 C 删去

从上述比较中不难看出，7 家出版社的 1997 年版教科书中，有 6 种教科书明确记载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当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新版的教科书送审本中，却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还保留了这一记载。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记载，1997 年版的 7 种教科书全部记载了那一事实，而新版的教科书送审本保留这一记载的只剩下 3 种了。另外，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关于侵略行为的记述，2002 年送审本与 1997 年版教科书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二 1997 年版日本的教科书

在介绍 2002 年日本中学社会科教科书送审本的时候，我们用 1997 年版教科书作为参照。应当承认，尽管 1997 年版的教科书在侵略战争的记述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毕竟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客观的描写，也触及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与战后日本进步力量在侵略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进行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以家永三郎先生为代表的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为了在教科书中反映侵略战争的史实，同右翼和保守势力持续进行了数十年的艰苦的斗争，包括进行了长达 32 年的“教科书诉讼”。

1952 年，当时担任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家永三郎先生为日本的中学编写了一部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并于 1953 年

开始发行。家永先生根据战后揭露出来的许多确凿的历史事实，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和“从军慰安妇”等历史史实，批判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性战争。

但是，家永三郎先生编写的教科书在 1963 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理由是“正确性与内容的选择上有明显的缺欠”，“事实的取舍、选择方面欠妥”，“记述往往流于评论，语气和表达不符合教科书的方式”，“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的反省”，“与日本的教科书的目标相去甚远”，等等。家永先生在修改后于 1964 年重新提出申请，又被审定有 293 处不合格的地方，要求他必须修改。家永先生感到气愤，因为许多被要求修改的地方直接涉及日本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而这正是家永先生认为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针对文部省的审查违背了日本宪法关于保障表现自由，保障学问自由和保障教育自由的原则，家永先生在 1965 年 6 月 12 日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了诉讼，又在 1967 年 6 月 23 日以文部省为对象提出第二次诉讼。在这以后，针对日本政府对教科书审定的力度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家永三郎先生于 1984 年 1 月 9 日又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第三次诉讼。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学者同日本政府之间的诉讼过程。

那些被文部省审定后要求必须修正删改的地方大部分与日本对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有关，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有：

(一) 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

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明确指出了日本与中国之间战争的侵略性质，在许多地方使用了“侵略”一词。但是，日本文部省反对使用“侵略”一词认定战争的性质，提出“‘侵略’一词是含有否定意义的评价，在教科书中把这种含有否定性价值评价的语言用于本国

[日]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十年》，ほるぶ总联合发行 1974 年版。

的行为,对于下一代国民的教育不利”。文部省提出的修改意见是用“武力进出”一类“客观性”的词语取代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

(二) 关于侵略战争对日本人民也是一场灾难的认识

家永先生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以十分鲜明的观点指出:由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是空前的灾难。而文部省认为这样的认识是对战争中日本立场和行为的片面的批判,说这样写历史过于强调了战争的阴暗面,不能使学生对处于战争灾难中的日本的立场和行为有正确的理解。

(三) 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认识

家永先生在编写教科书的当时,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所以他在书的正文中还没有对事件本身进行具体的叙述,只是在注释中明确指出:“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即杀害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文部省对这样的注释也不同意使用,称:“根据这一注释,可以被理解为占领之后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但不能这样解释,应予以改正。要说明那是在‘混乱’之中发生的事情。”

(四) 关于对“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揭露

家永先生的教科书是在日本比较早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文部省的审定意见则认为:“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迄今为止还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在教科书中使用为时过早。”

(五) 关于日本军队奸淫妇女的行为

家永先生在教科书中痛斥了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对和平的无反

[日]德武敏夫:《家永诉讼の四分之一世纪》,あずみの书房 1991 年版。

[日]教科书检定诉讼を支援する全国连络会:《三·一六教科书审判》,1993 年。

[日]教科书检定诉讼を支援する全国连络会通讯,第 316 号,1994 年 8 月 20 日。

抗能力的妇女的施暴行为,文部省的审定意见则认为:“奸淫妇女的事情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战场上都有发生,这不是日本军队所独有的事情。”

此外,在关于朝鲜人民的抗日运动,关于“冲绳作战”问题和有关日本历史的许多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上,教科书与文部省的审定意见都有明显的分歧。

对以上文部省要求修改的审定意见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是反对通过教科书向日本的年轻一代讲述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真实,而按照那些审定意见讲述“光明的日本”的话,所宣扬的仍然是战争时期的天皇神圣的“皇国史观”。

家永先生认为,如果听任文部省和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将会对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作为教育家,他特别重视教师和教科书对于年轻一代的教育示范作用。他认为教师担负了重大的社会责任,对于过去战争的历史责任,必须向学生说明,否则不可能防止新的战争的发生。他一再以自己的经历和教训告诫日本的教师说:“我在战争期间就当了教师,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因为当时的教科书是由政府规定的,不许使用其它的教科书,不许教师独立编写教科书介绍自己的观点。我自己虽然没有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我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我教过的学生都上了战场,有的战死了。一想到是我用那些教科书教育了他们,我就觉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认为未能制止战争也是应当反省的。”家永先生认为这是“无作为”的责任。关于教科书,他也有特别深刻的理解。他指出“战争期间编写教科书的骨干

[日]教科书检定诉讼を支援する全国連絡会:《三·一六教科书审判》,1993年。

[日]教科书裁判国际委员会:《世界が报じた家永教科书裁判》,エイテル研究所,1998年。

都是由日本陆军教育统监部的军人担任的, 所以他们在教科书中竭力鼓吹效忠天皇, 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正是出于对侵略战争的痛恨和憎恶, 家永先生决心用毕生的力量为维护教科书的科学性而努力, 这就是教科书诉讼进行了 32 年之久的动力。

另外, 家永三郎先生还基于教育和出版自由的原则在诉讼中要求日本政府取消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教科书的三次诉讼是分别独自进行的, 每一次诉讼均需经过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第一次诉讼经最高法院在 1993 年 3 月 19 日作出了家永败诉的判决。第二次诉讼在 1975 年 12 月 20 日经东京高等法院的审理本来是判为家永胜诉的, 但被最高法院驳回重新审理, 结果在 1982 年 4 月 8 日废除原判, 改判家永败诉。

第三次诉讼提出后, 在 1993 年 10 月 20 日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中, 认定文部省审定的一部分意见是违背日本宪法的, 具体为: 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 关于日本军队对妇女的暴行的问题和关于“草莽队”问题, 同时还判决家永先生获得 30 万日元的微不足道的赔偿金。

1997 年 8 月 29 日, 日本最高法院对第三次诉讼作出最后的判决, 在上述东京高等法院判决的基础上, 又作出了在“‘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上, 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违背宪法”的判决。这样, 文部省对家永三郎的教科书的审定意见有四处被判违宪, 并判定给予家永三郎 40 万日元赔偿金。但是, 最高法院仍判定文部省审定教科书这一制度是合乎日本宪法的, 否决了家永先生关于审定教科书制度违宪的指控。

尽管诉讼的最终结果还不能说是完全的成功, 但是长达 32 年

[日]德武敏夫:《教科书の战后史》,新日本出版社,1995 年。



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对历史教科书中正确描述侵略战争历史事实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从1955年起在教科书中消失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从1974年起,先是被一种高中教科书和一种初中教科书采用,70年代后半叶,30%的教科书开始采用,而到1984年,几乎全部教科书都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到1992年,甚至出版小学教科书的7家出版社中也有6家采用了这一史实。

教科书中以前从未采用的“从军慰安妇”的史实,从1994年起,由23种高中的日本史教科书和8种世界史教科书开始记载;1997年7种初中社会科教科书开始记载。

一度被文部省要求改为“进出”的“侵略”一词,也在90年代以后被各种教科书明确地使用了。

如上所述,正是通过日本进步力量的积极努力和国际舆论的促进,特别是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日本国内进步力量在长达32年间进行的诉讼,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才相对逐步地反映了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所以说,1997年7家出版社的中学社会科教科书记载侵略战争史实是正义力量战胜右倾保守势力的结果。

三 再次篡改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政治倾向

与上述历史过程相比较,2002年版教科书送审本关于侵略战争史实记载的变化,是日本社会90年代后期政治倾向变化的反映。实际上,战后每当日本政治处于特殊的变动时期的时候,关于战争的历史观以及历史教育都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掀起相当大的政治波澜。

日本战后第一次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政治波澜发生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的冷战初期。本来,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

本国内保守势力已经抬头,来自右的方面的政治逆流逐渐加强,在教科书中反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被批评为“影响建立日本人的爱国心”,而文部省也相应地在1956年设立教科书调查官制度,1958年颁布对教科书的严格审查的标准。此后,这一标准又多次修订,一次比一次严厉。按照这一标准对于日本历史教科书审查的结果,1958年当年就有33%的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在这样严厉的审查制度下,教科书正确反映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几乎已不可能。而到1965年,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得到了实施,国民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丧失了对于保守政治的警惕性,从而使原来遭到激烈反抗的日美军事同盟得到加强,自卫队也谋求自身的发展,积极制定军事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前的“皇国史观”堂而皇之地以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面目出现;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手段和不发展军队承诺的言论和行动也活跃起来,日本政治出现了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与这样的形势相呼应,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编写宣扬“皇国史观”的教科书在文部省很容易获得通过,而揭露战争罪行的教科书则受到严格的审定。一位负责审定教科书而事实上是“皇国史观”教科书主编的文部省调查官的村尾次郎公然声称“我就是拥护‘皇国史观’,我就是国粹主义者,国粹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他还说“不在教科书中颂扬乃木、东乡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对历史教科书冲击的第一次浪潮,一直持续到70年代。家永三郎先生的第一次诉讼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许多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迫使许多正直的学者中途折笔,放弃了教科书的编写。而支持编写正确认识战争责任的教科书的日本教育工会(日教组)、出版工会等都受到政治压力甚至迫害。

[日]家永三郎:《教科书から消せない戦争の実相》,青木书店1996年版。

家永三郎先生提出第二次教科书诉讼的 80 年代, 是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的时期, 在强大经济实力基础上, 日本国内滋生出强烈的要成为“政治大国”的社会意识, 而在历史观上, 则要求建立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及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历史观念。1983 年, 当时的首相中曾根首次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 激励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而与此相呼应, 他对日本战后的历史观提出非难, 说: “日本在战前, 曾经有所谓的‘皇国史观’, 因为日本战败了, 所以历史观转变为‘太平洋战争史观’或‘东京审判史观’。东京审判以日本为被告, 但是法律是联合国自己制定的, 在人道与和平的名义下对日本进行了裁决。但是这样的历史判决是不是正确, 还有待于历史的判断。”在这里, 他表达了对把日本置于战败国的位置上进行“东京审判”的强烈的抱怨, 认为这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主要障碍。因此, 他提出要进行“战后政治的总决算”, 彻底否定以和平宪法为代表的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成果, 彻底否定“东京审判史观”。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 当时的日本社会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修改和平宪法问题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而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教科书的编写和教育方针也是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内阁中设立了“教育问题临时调查委员会”。根据与战后历史进行“总决算”的原则, 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审查更加严格, 要求教科书把“侵略”改为“进入”或“进出”, 把“镇压”改为“压制”, 把“掠夺”改为“转让”, 把对日本的“抵抗运动”改为“暴动”, 同时对“七三一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战争责任问题竭力掩盖, 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对教科书的冲击和篡改的浪潮。这一次冲击在 1982 年引起了亚洲各国的警惕, 在各国的抗议声中, 日本政府表示要承担起责任, 倾听亚洲各国的批

[日] 大规健编《教育改革を问う》, 大月书店 1984 年版。

评。在这之后,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中加上了“在涉及到与近邻的亚洲各国相关的历史事实的时候,需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的原则。

从那时以来,特别是从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日本的一部分历史教科书逐渐吸收了战后日本进步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但是,2002 年教科书送审本在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记述上为什么又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这样的倒退有没有发展为关于教科书的第三次波澜的危险?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虑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政治倾向的新变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科书的变化是日本政治倾向变动的晴雨表。

教科书最近的动向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出现的“重新认识”战争历史的思潮的发展结果,而那一思潮起因是 1994 年细川护熙作为联合执政首相关于战争性质问题的谈话,因为他当时说:“我认为(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他还表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结束 50 周年时表明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谢罪。由于这是自 1955 年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局面的第一次被打破,加上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国际关系背景,日本社会的思想正处于混乱时期,这一日本历届首相中最为明确的一次表态,立即引来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右倾政治家的猛烈的攻击和责难。右倾保守的国会议员在攻击细川首相,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中是骨干力量,由这些人组成的“历史检讨委员会”表示:“细川首相关于侵略战争的发言和关于战争责任的谢罪是以反省战争的名义宣扬‘自虐史观’;我们不能容忍,要在公正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日本人光明的历史观。”可见从一开始,关于战争的历史观问题就成为争论的

[日]家永三郎:《教科书から消せない戦争の実相》

[日]历史检讨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の总括》,展转社 1995 年版。

核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政治家组成的“历史检讨委员会”并不直接站在第一线，而是要学者打头阵，由他们给予资金和其他的支持。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历史检讨委员会”网罗了一批学者，以总结历史的名义，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原因、过程、结果的诸方面都进行了根本的翻案，其标志是1995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世界人民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那些人则演出了一场歌颂“大东亚战争”的闹剧，在日本社会泛起了一股“重新认识”战前历史的思潮。

但是，在纪念战后50周年的热潮过去之后，这股“重新认识”侵略战争历史的闹剧并未停止，而由“自由主义史观”的日本学者把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任务接了过去，并把攻击的目标直接指向暴露侵略战争史实的历史教科书。

“自由主义史观”的核心人物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藤冈信胜。他在1994年提出要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教育进行彻底修正的主张，并建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自由主义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近现代历史教育一直被两种历史观所主宰：一是来自苏联——俄罗斯的“共产国际史观”，那是建立在俄罗斯报日俄战争失败之仇的基础上的历史观，“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光荣的历史描写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军事帝国主义的黑暗的历史”；二是来自美国等国的“东京审判史观”，那是战胜国要把战争责任强加给战败国日本的历史观，“不承认日本在亚洲领导的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他认为现行的日本教科书受那两种历史观的影响，“充满了对日本人的恶意”，“宣扬黑暗的、自虐的历史观”，宣扬导致了日本“国家精神的解体”的历史观。藤冈开始特别攻击在教科书中反映包括“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问题在内的侵略事实，认

[日]家永三郎：《教科书から消せない戦争の実相》

为那是故意给日本“抹黑”的阴谋。后来，他又把“自虐史观”和“反日史观”的攻击对象确定为1997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他声称：在学校的教育中介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就会“使国民染上反日思想”，会导致日本的学生“厌恶日本的历史”，出现“讨厌日本，蔑视日本人的倾向”；给孩子们使用那样的教科书，就会“腐蚀、瓦解日本”，使日本变成了“没有值得自己骄傲的历史，没有国民的自我”的民族；他们认为：“只要不修改教科书，日本国家精神的解体就是迫在眼前的事。”

在“自由主义史观”的煽动下，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声讨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大罪”，并于1997年1月30日建立了“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会”，声称要编写一部“把日本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正确地描绘日本国和日本人；赞美祖先的荣耀，了解和感受他们失败的痛苦”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学生的日常读物。在该会的会章第三条中有这样的记载：编写教科书，将教科书送到学生和儿童的手中。“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比“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广泛得多，其核心人物不仅有历史学者，还有教育学者、文学家、漫画家等各种类型的人物，说明“自由主义史观”的影响从教育界向整个社会扩散。他们的目标就是编写新的，为广大的国民都接受的“历史教科书”。为此，他们认为首先应当编写普及性的“国民历史”的小册子，还要争取新教科书通过文部省的审查，进而要让各地采纳“新历史教科书”。

“自由主义史观”运动在现实社会中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利用许多宣传媒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为使“自由主义史观”运动在社会影响广泛，他们组织了“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运动”。藤冈信胜冲在运动的最前列，在各种

[日]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层》，学习の友社，1997年。

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布文章。1996年，“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发表了紧急宣言。此后，各种团体向全国各地的自治体议会提出了请愿，要求将有关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从中学的教科书中删除。到1998年的10月5日，已经向33个都道府县的议会提出，其中有8个县议会已经采纳；在339个市区町村议会中，有42个议会采纳。在那之后，他们又提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问题，在其网页上大肆鼓吹“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内容。

“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在成立后在日本各地建立分会（支部），成员已经近1万人。每年都组织各种宣传活动，1997年举行的大型活动83次，1998年173次，1999年246次，而今年到9月已经举行了139次。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的书籍，猛烈攻击现行的教科书，这些书籍大多摆放在各书店的醒目的地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97年3月到2000年6月，专门攻击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专著89种，其中有许多种是以多卷本的形式出现，如“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发行的“向孩子们讲述历史”就是多达90卷的大部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小林义则的以漫画形式出版的《战争论》和西尾干二编写的从根本上推翻日本近代历史体系的《国民的历史》。前者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描写为日本年轻一代为祖国献身的过程，竭力鼓吹日本军人的“公”的精神；而后者则在强调日本精神的同时，故意抹煞日本历史上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事实，系统地把日本的历史篡改为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独立发展起来的“国民的历史”。这些书籍在出版前后，“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发行运动，以至发行量都在50-70万册以上。这个组织还把藤冈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印成小

[日]井笠富雄：《历史、自夸、国民国家》，载《九州历史科学》第25号，1997年。

[日]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层》，学习の友社，1997年。

册子,向各驻日本大使馆赠送,把代表其观点的书籍广为散发到日本各地教育委员会委员的手中,向其施加影响。这一组织要求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删除1989年制定的“在涉及到与近邻的亚洲各国相关的历史事实的时候,需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的原则,公然与亚洲各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历史认识相对抗。

不难看出,日本社会的上述背景是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出现的直接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史观”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潮,正如有人指出的,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运动,并且不是少数派的运动,在日本社会获得了相对广泛的支持。

支持“自由主义史观”运动的有自民党的保守派议员,他们在国会中成立了“教科书问题专门委员会”。原法务省大臣永野茂门、原环境厅长官奥野诚亮等相继发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讲话,声称在教科书中记载“从军慰安妇”问题就是“自虐”,而现任文部省大臣町村在回答质询的时候表示:“教科书审定制度要保证把‘自虐’性质的记述改正过来。”

支持“自由主义史观”运动的还有许多右派团体,他们成立了“改善教科书联络协议会”、“历史教育讨论会”、“促使教科书正常化”等组织,表示与“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携手努力,以日本全国14000人的教育委员为对象进行积极的活动,敦促他们承认教科书的篡改。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右派组织几乎都在本团体的行动方针中加入了针对教科书的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会在1999年通过了长期议而未决的

“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事务局长俵义文提供的资料:《教科书攻击派の最近の动向》之一、之二。

同上。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相关法案,解决了战后曾经遭到强烈反抗而未获统一认识的国旗国歌问题,据说讨论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也有可能提上日程。还有甚者,在任的首相竟然冒出了“日本是‘神’的国家”的发言。而关于历史教科书,1998年当时的文部省大臣町村信孝曾经表示过现行的历史教科书缺乏整体的平衡,否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历史的地方太多,要求在今后的审定中注意平衡。结合这一系列政治倾向的变化,不能不使我们更加关注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四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思考

2002年版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送审本所反映的问题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作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被害国的国民和学者,对于日本社会出现的这一问题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分析这一变化所产生的政治背景和倾向当然也很重要,可以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有更清醒的了解。但是,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发生仅仅表示义愤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的思考似乎还需要更进一步,需要综观日本战后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发生的历史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特别是如何与日本国内的学者就战争责任的问题进行交流和如何向日本的年轻一代进行战争历史的教育,如何使其认识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

(一)日本的进步学者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和战后的历史责任是有一定觉悟和认识的,正因为如此,战后50多年来日本的右倾保守势力才对包括1997年版在内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

“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事务局长俵义文提供的资料:《教科書攻撃派の最近の動向》之一、之二。

轮又一轮的攻击和篡改。这固然证明了在日本围绕战争问题进行正确历史教育的难度,但是也让我们更加钦佩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正确历史教育的日本的学者们。中国的学者当然希望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能够更加科学准确,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年轻一代,而这有待日本学者的努力,“越俎代庖”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学者可以用自己的科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侵略战争罪行的深刻揭露,为日本学者提供重要的资料。

在日本,许多努力从事和平教育的历史教师普遍认为日本教科书忽视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侵略战争历史的教育,即使有所介绍,内容也相当简略,资料也极其缺乏。为补充教科书的缺陷,他们希望从中国以及亚洲被侵略国家的教科书或有关历史著作中吸取营养。1998年,我曾经参加过日本和平教育组织的全国会议,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日本教师在那个会议上交流如何让学生理解战争的侵略性质和自己的战争责任的经验,展示自己编写和制作的教材,其中许多人向我提出希望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形象典型的资料的要求。当时我想,如果中国学者关于侵略战争罪行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广为发行,日本的和平教育会进行得更加成功。

(二)几乎所有的日本进步教师在向学生进行和平教育的时候,都会举出以日本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为代表的著作作为介绍日军侵略罪行的补充教材。本多的书是1981年起发行的,已经再版20多次。虽然只是十数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是其社会影响之大,远远超过许多皇皇巨著。直到今天,许多日本人关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的认识,还是来自这本书。其实,书中涉及到的抚顺的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内容,中国学者早已进行了研究,而且战后中国学者的研究涉及范围更宽更广。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本多胜一的介绍,恐怕绝大多数日本人至今仍不会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这还不仅

是语言文字不通的问题。读过本多的书的人都明白，作者并非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直接拿来进行简单的翻译，而是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对历史事实亲自进行调查、思考和认识，作者与中国被害人之间感情的直接交流和细腻的笔触是使日本人受到触动的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告诉我们，为了给教科书提供补充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性研究是多么必要。

(三)在日本，普通市民对于战争的认识更多的是偏重于战争的受害。许多人对于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等城市受到的空袭以及冲绳作战等日本平民受害的历史情形耳熟能详，但是对于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行为则知之甚少，战后出生根本没有战争经历的一代人更是一无所知。对于他们的绝大多数来说，是从日本人的战争被害的角度理解战争的残暴性的，而没有能够从战争“加害”的角度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这是战后50多年来日本和平教育视野狭隘的偏向。偏重于被害意识的和平教育固然也能强化普通日本人的反对核武器和反对战争的意识，而且也使许多人不再接受狂热鼓吹战争的“皇国史观”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但是视野的狭隘则影响对鼓吹“爱国”的“自由主义史观”的识别能力。所以，在教科书中准确科学地介绍日本的战争“加害”是战争历史教育的关键，而在教科书中正确地分析“爱国”与“自虐”的关系，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更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必须解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从事这一历史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应当对此有所思考。

(作者步平，1948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